

《三字经》是什么货色

华中农学院学员 易仁森 张良玉 汪新平

《三字经》是南宋末年王应麟编纂的一本发蒙课本。全书仅仅三百余句，不到一千一百字，但字字句句都浸透着孔孟之道的毒汁，是一部五毒俱全的大毒草。它出笼以后，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儒生们的欣赏。他们煞费苦心加以充实、注释、训诂、搞插图、齐韵脚，使这部反动的《三字经》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口语化，便于大量倾销。清代统治阶级明文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先读《三字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派重新加以修补增订。《三字经》之所以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强行推广，原因就在于它系统地宣扬孔孟之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反动的教育观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它不仅是一本识字课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是一本用孔孟之道害人的害人经，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吃人经。

《三字经》在南宋末年（十三世纪）出笼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多种供发蒙用的识字课本，为什么此时名列“大儒”、著书六百余卷、身居礼部尚书的王应麟要亲自动手来编这种浅俗的教本呢？完全是由于反动地主阶级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入衰落后期，地主阶级走下坡路的时候，封建制度更加腐朽，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对外采取投降政策，对内采用加包赋税、扩大官田、无限制地发行纸币等手段，残酷压榨劳动人民，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整个宋朝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以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么等二百多起农民起义，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封建制度。方腊在起义中“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杀官吏、儒生，指斥封建压迫的行为是“安有此理”，主张要“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才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杨么指斥“国典为邪法”，认为只有“等贵贱”，“均贫富”才是“天理当然”，要把造成贫富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均”掉，要把人分贵贱的封建等级制“等”掉，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剥削和压迫。农民在政治上要求贵贱平等，在经济上要求土地平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经过一千多年的斗争实践而获得的极为可贵的认识。这表明农民阶级反对封建斗争的思想觉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种情况，地主阶级极为害怕。他们向农民举起屠刀残杀的同时，还特别加强了对农民的思想统治。“程朱理学”和《三字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笼的。

《三字经》的编者王应麟（公元1223——1296年），字伯厚，是个大地主、大官僚、

大儒生，淳祐元年的进士。他开始做官为西安主簿，对缴纳赋税稍为迟一点的农民就“绳以法，遂当办”，凶狠地镇压、迫害农民。他认为当时是“卑踰尊，外陵内”，封建统治秩序乱了套。他主张大肆宣扬“天命论”来蛊惑人心。“当清天君，谨天命，体天德，以回天心”，“应天变莫先回人心”。妄图以“回人心”来巩固封建统治。他极力主张“防未萌之欲”，从小孩子欺骗起。他在这方面很是卖劲。那时，《急就篇》是一本流传甚广的识字课本。为了灌输孔孟之道，他就加以注释，写了《补注急就篇》六卷、《姓氏急就篇》六卷（《宋史》，卷438《王应麟传》）。《急就篇》是地主阶级上升时代产生的，宣扬孔孟之道的字句甚少，虽经补注，终究难于适应当时地主阶级走向没落的时代的需要。于是，他又抛弃它，编写了完全是宣扬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三字经》，以代替《急就篇》，作为新的识字课本。在《三字经》中，他公开写道“为学者，必有初”。《三字经》就是作为初学者的读本，从儿童的幼小心灵毒害起，使之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受孔孟之道的统治，长大了甘心受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从《三字经》的出笼就可以看到它的反动实质。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剖《三字经》，暴露其实质，批判其谬论，肃清其流毒，从各个角落里扫除孔孟之道，很有必要，很有好处。

一、“性善论”是《三字经》的理论基础

《三字经》一开始就写道：“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孟轲宣扬的“性善论”，认为每个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这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是道道地地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善恶是有阶级内容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善、恶和人性，更不存在先天的善、恶和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以，“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而这种鬼话正是《三字经》的理论基础。

孟轲宣扬“性善论”，他是不是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呢？不是的。他认为性善是先天的，要一切按天意的安排才能保存这种先天的性善，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食人，劳力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剥削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他认为天意安排的。奴隶主遵守这种剥削、压迫奴隶之“通义”，所以保存了先天的性善，而奴隶反对这种剥削、压迫的“通义”，则失去了这种先天之性善。所以孟轲又说先天的性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存之”，性善；“庶民去之”，性恶。因此，“性善”的君子就应该去镇压“性恶”的庶民了。由此可见，《三字经》竭力鼓吹的“性善论”，完全是为奴隶主、地主剥削和压迫奴隶、农民辩护的谬论。

孟轲为了论证人性本来是善良的，胡说什么“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谓惻隐之心就是仁，羞耻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仁义礼智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先天就有的。孟轲以先验论的性善为根据，鼓吹奴隶主阶级的仁义礼智，完全是维护奴隶主专政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内容的。在政治上，他以维护“世卿世禄”为善。在经济上，他以恢复“井田制”为善。在思想上，他以“法先王”，维护奴隶制的旧礼教为善。在孟轲的眼里，柳下惠反对“不耕而食，不织而

衣”的奴隶主阶级，要求建立“耕而食，织而衣”，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那就是恶，就是“盗”，就该杀。奴隶和农民反对“井田制”，“辟草莱”（开荒）这也是恶，该服重刑。所以，孟轲说的这个善，与孔老二的礼和仁之类是一脉相承的。这明明是奴隶主阶级的人性，《三字经》却要把它吹成所有人的共同本性，并举“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为例，妄图证明这种性善真是先天的，以超阶级的人性来掩盖地主阶级专政的阶级实质，把杀人屠刀藏在“性本善”的伪装下边。几千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不是都打着“行善”的招牌，干着“不杀穷人不富”的反革命勾当吗？杨白劳不是被挂着“积善堂”招牌的黄世仁活活打死的吗？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一面叫嚷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一面却在阴暗角落里磨刀霍霍，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屠杀广大劳动人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可见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所谓“性本善”的说教，统统是骗人的鬼话。《三字经》抹杀阶级的区分，宣扬“人之初，性本善”，正是为了掩盖地主阶级杀人、吃人的丑恶面目。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地主阶级编造的“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将心比心”等，都是宣扬抽象人性论的。他们还从人性论出发，大肆宣扬宗族观念，胡说什么“同姓一家人”、“人不亲土亲”，企图用人性论和宗族关系来模糊阶级界限，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亲不亲，阶级分”，“无产阶级是一家人”。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分清敌友，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彻底批判《三字经》所宣扬的孔孟的反动“人性论”。

二、“三纲五常”是《三字经》的核心内容

《三字经》宣扬人们的学习要“首孝弟，次见闻”，把地主阶级的政治放在第一位。《三字经》的核心内容就是鼓吹董仲舒编造的“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为了强调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不允许紊乱，《三字经》还用所谓的“三光”（就是天上的日、月、星）和“五行”（金、木、水、火、土）来神化“三纲”、“五常”，说它们都是“本乎数”、“运不穷”的宇宙法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永远不会改变。地主阶级的统治是日、月、星一样永世长存。被统治者就必须严格遵守封建秩序，不允许紊乱，如有违背，就是违背了“天理”，那也就理应被杀的了。因此，农民起来造反，便是有罪。更为荒唐的是，《三字经》发展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反动伦理，并具体化为“父子恩，夫妻顺，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这“十义”。按照“十义”的准则来处理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切按孔孟之道处理，妄图使封建王朝永世长存。这是一种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理论。所谓“君为臣纲”就是政权，“父为子纲”，就是族权，“夫为妻纲”就是夫权。他们宣扬这“三纲”原是天意所规定的，即是宣扬神权。地主、豪绅、族长们把守着政权、祠堂、庙宇，举着“三纲”旗号，口里叫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用鞭打、挖眼睛、砍断手脚，割掉鼻子、耳朵，甚至沉潭、杀头等刑罚作为他们的“正家法”，镇压无辜的农民。有多少人死在这种吃人的刑法之下，这就是反动地主阶级的“仁”，这就是他们的“义”，

一句话，就是豺狼们吃人的“纲”与“常”！毛主席指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条绳索把中国人民死死地捆了几千年。《三字经》的胡说八道，归根到底，就是宣扬压迫有理，造反有罪，就是妄图阻止人民起来造反。但是，反动地主阶级无论是用铁打的脚镣手铐，还是“三纲五常”一类精神枷锁，束缚不了中国人民，历史上的农民斗争连绵不断、风起云涌，就是证明。正是农民的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翻了身，地主阶级的“三纲五常”已被摧垮了。但林彪竟然无耻吹捧那个首创“三纲五常”的董仲舒，也就是鼓吹董仲舒的“统一天下之道”，妄图把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四大绳索重新套在人民的脖子上，实现“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然而，这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孔孟之道挽救不了封建制度的灭亡，也同样挽救不了林彪一伙覆亡的命运。

三、“学而优则仕”是《三字经》鼓吹的反动教育思想

《三字经》从头至尾是讲学和教，宣扬孔孟的反动教育思想的。过去，反动统治阶级把它定为“蒙训”，实质上是利用孔孟之道来训化顽固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忠实信徒。

《三字经》编纂者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系统地宣扬地主阶级教育观。它首先从反动的宗教着手，什么“子不教，父之过”，引伸到“教不严，师之惰”。把不教“学而优则仕”思想和不读“四书”“五经”当成一种罪过。它的家教方法仿效“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和袁熙山“教五子，名俱扬”的“义方”。学什么，教什么呢？《三字经》列了一个书目：“小学终，至四书”，“如六经，始可读……”。在通晓复古守旧道理之后，就按照孔丘“学而优则仕”的原则，经过所谓选举与考试，取得举人、进士等头衔，然后当封建政府的官吏，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条“读书——做官——奴役人民”的公式，就是《三字经》所鼓吹的学习目的及其教育路线的反动实质。《三字经》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披蒲编，如挂角，如映雪，锥刺股”等读书做官典型，无非是宣扬“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光宗耀祖、“做人上人”的反动目的。《三字经》所说的“下泽民”，这个“民”实际上就是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的能有那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上致君”、“扬名声”才是他们勤学目的的自我刻画。叛徒、卖国贼林彪对《三字经》鼓吹的反动教育思想心领神会。他书赠条幅，教其子读经要“韦编三绝”，这种反革命的教育方法和目的，正是与孟母教子学礼的一套完全一样，是为了“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舞台，领导斗、批、改和教育革命，工农兵上大学，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林彪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野心，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干部走“五·七”道路是“变相失业”，妄图用孔孟之道来蒙蔽广大群众，破坏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真是可恶至极。我们必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

四、“天才论”是《三字经》宣扬的唯心史观

《三字经》通篇浸透了唯心史观，什么“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三字经》的作者把七、八岁的小孩美化为神童，把历史说成是由少数几个英雄人物创造的，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其目的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涂脂抹粉，以便说明他们生下来就是应该统治人民的。世界上难道真的有什么“生而知之”的神童吗？从来没有！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三字经》所吹捧的这些没有社会实践的七、八岁的儿童所作诗赋，不可能有什么新词新意，也根本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鲁迅先生说得好：“其实，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人一样，决不是一首好诗。”这种幽默的讽刺，对《三字经》鼓吹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林彪也曾恬不知耻地说：“我的脑袋长得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还把自己的儿子吹成龙种凤雏，说什么不仅思想象他，而且语言也象他，因此也是个“天才”。林彪死党极力抬轿子，吹喇叭，吹嘘林彪是伟大的“天才”，肉麻地吹捧林彪的儿子是什么“高于群众，高于历史，高于认识”的“超天才”。真是卑鄙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天生的聪明是没有的，人的智慧靠实践，依靠阶级的实践，靠党，靠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就根本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的认识离开了实践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校工农兵兼职教师罗河山同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防虫治虫的规律和经验，为发展社会主义林业做出了贡献，被人们热情地称赞为“土专家”。铁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林彪一伙使劲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就是要象《三字经》那样神化剥削阶级、美化自己，为他们篡权复辟，统治人民作舆论准备。然而，这是痴心妄想，最后只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吹捧“三字编写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问句知诂解，子史经书一贯通”。《三字经》出笼七百余年来，流毒广，影响深。在大叛徒刘少奇的支持下，现代儒生吴晗在一九六〇年公开叫嚷：“《三字经》是一本好书，可惜冷落了几十年，现在要继承这份遗产。”有人甚至把《三字经》中孔融让梨及囊萤映雪等“勤学”故事，编入中小学课本及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资料中，使千千万万的儿童、青少年及教师受到毒害。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人在宣传《三字经》中的那些典型，有人无端生有地捏造洪秀全为贫苦儿童耐心讲解《三字经》的故事，歪曲农民领袖洪秀全的英雄形象。这些情况，无不说明《三字经》的流毒是很深的。因此，批判《三字经》一类坏书，肃清其流毒，是今天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定要把《三字经》所宣扬的各种反动谬论批深批透，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